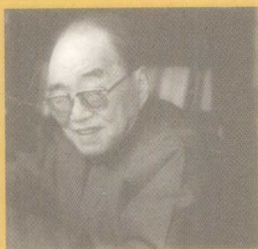


徐铸成作品系列 03



徐铸成回忆录
〔修订版〕

◎ 徐铸成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徐铸成作品系列 03

徐铸成回忆录
〔修订版〕



徐铸成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铸成回忆录/徐铸成著. —修订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1

(徐铸成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3267-6

I. 徐… II. 徐… III. 徐铸成(1907~1991) —回忆录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6964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封面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字 数 292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2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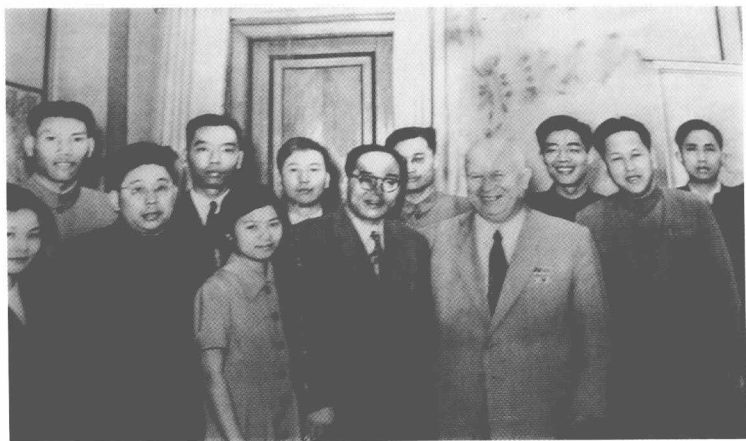
《徐铸成回忆录》初版书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作者手书的《自鉴》绝句，写于1987年5月，本书完成时。

胸有是非堪自慰
 至无不可对人言。
 深夜扪心无愧怍，
 会忆谈笑赴黄泉。



1985年春节，作者在上海
江宁路寓所。（下图）
1986年8月，作者在上海
寓所伏案写作。



1957年3月，作者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赴前苏联访问。

1957年5月8日，赫鲁晓夫在办公室接见中国新闻代表团。照片在十年动乱中被造反派抄去，「文革」后发还。照片上徐铸成、赫鲁晓夫被红笔画上×，并有批字：「赫秃头」、「罪该万死」。（下图）



1957年4月，作者访问前
苏联时摄于列宁格勒普
希金铜像前。



1981年二月，作者被增
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时摄
于北京友谊宾馆。

前 言

徐铸成先生是著名的记者、新闻评论家和新闻学家。他在国闻通信社和《大公报》工作十八年，从记者、编辑到担任地方版总编辑；其间和后来又主持《文汇报》笔政十一年，实践了自己的办报理念；被划为“右派”二十三年，历经屈辱和磨难；晚年著述十一年，有大量著作行世。

在《大公报》和《文汇报》期间，作者写下了三百余万言的新闻、通讯、游记、评论等，其中部分文章收入了其学生贺越明编选的《徐铸成新闻评论选》（1984）、《徐铸成通讯游记选》（1986）和《徐铸成政论选》。与他人合撰了《朝鲜纪行》（1952），还编写了《与教师谈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60年代初为香港《大公报》撰写旧闻掌故，后编为《金陵旧梦》（1963）在香港出版。

1978年后，作者陆续撰写了二百余万言的回忆史料、小品掌故、人物传记和新闻学术论著，已出版的有：回忆掌故三种：《报海旧闻》（1981）、《旧闻杂忆》（1982）、《旧闻杂忆续篇》（1983）；新闻学术二种：《新闻丛谈》（1984）、《新闻艺术》（1985）；人物传记三种：《杜月笙正传》（1982）、《哈同外传》（1983）、《报人张季鸾先生传》（1986）；杂感、随笔、游记等合集四种：《海角寄语》（1980）、《旧闻杂忆补篇》（1984）、《风雨故人》（1985）、《锦绣河山》（1987）。

作者去世后，其生前完成而因故未能问世的《徐铸成回忆录》（1998）出版，部分旧著重编为《报人六十年》（1999）、《徐铸成传记三种》（1999）和《旧闻杂忆》（合编本，2000）印行。除上述著作外，作者遗留的文字，还有日记、讲稿、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检查和

活动交代以及一些未发表的文稿。

在这次编辑徐铸成作品系列的过程中，除将有关新闻学术的著述单独结集，并把收入已出版文集中经作者生前认定明显相关的文章重新归类编选之外，其他的则未做变动。这样处理，或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貌，使读者易于了解和研究作者的思想脉络、作品成果和发表意图。这既是编者的初衷，也与三联书店的一贯风格相吻合。

《徐铸成回忆录》是作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原名《八十自述——自编年谱》，写于1985年3月至1987年12月，期间曾部分刊发于香港《华人》杂志和上海《人才开发》杂志，后交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该书印成后，出版社方面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作者未予同意，遂未发行。199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修订版《徐铸成回忆录》，此次修订增加了作者于1989年至1990年在原稿上做的修改和补充，并做了校正，也做了一些技术处理。2000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徐铸成回忆录》的繁体中文版，在三联版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校正。

此次重版以三联版《徐铸成回忆录》为底本，并参照江苏人民出版社原版和台湾商务版，全面恢复了原书原貌，并对有关人士提出的修订意见一一做了核实和校订。谨向提出修订意见和协助修订的有关人士深表谢意。

编者

2009年6月1日

目 录

前言	001
我为何写回忆录（代序）	001
楔子	004
第一章 负篋求知（1907—1926 年）	007
第二章 步入报界（1927—1937 年）	024
第三章 主持笔政（1938—1948 年）	063
第四章 民主报人（1949—1957 年）	152
第五章 坎坷生涯（1958—1976 年）	261
第六章 游历著述（1977—1987 年）	289
附录 “阳谋” 亲历记	334
死的解放	364
后记	366
徐铸成生平简表	369

我为何写回忆录（代序）

似乎久已绝迹的传记文学，1978年起在我国又逐渐繁荣起来。我也尝试写了几部：继《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之后，去年又出版了《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书林》是给以极大鼓励的，每出版一部，《书林》必让我写一篇东西，说明写作的动机和意图，向读者介绍。盛意可感。

现在，第四部试作——也许是最后一部习作《徐铸成回忆录》即将杀青。全书约三十万字。《书林》又要我先来“王婆卖瓜”一番。

和前三部书比较，有所不同，一是篇幅较多，二是它不是写别人的传记文字，而是写自己的编年体回忆录式的文章。写别人，力求神似，希望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在书上再现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写自己，能否也坚持同样的客观态度呢？我从1979年“解冻”开始写作之际，即抱定一个态度：于人，不囿于成见，不“以成败论英雄”；于己，既不乱涂白粉，也不妄加油彩，一切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尽量详尽地回忆过去所经历的事实。至于功过是非，则一任历史加以评说，自己少发议论。

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历史也很简单，自从开始工作以来，除了被迫搁笔的二十年外，一直从事新闻事业，而且始终在《大公报》、《文汇报》这两家报里转来转去，从未干过什么惊人的事业。所以起意想写这本回忆录，是因为我经历的时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而友人们也热情加以鼓励。我生于前清末年，开始工作时，赶上北洋军阀的末期——张作霖大元帅统治时期，曾目击国民党的兴起到它在大陆的覆灭。又曾在新中国度过几十年不平常的岁月，经历长期的风风雨雨，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拨云雾重见青天，过了近十年的充满希望、最令人愉快的时光。在这漫长而

曲折的六十年时日中，我曾五次亲自创建过报馆，又曾五次亲手埋葬（被封或被迫停刊）它们。其中经过，也许只有我一人明其前因后果，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至于所接触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难屈指。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也该趁记忆力尚未完全衰退之际，抓紧时间，尽可能加以回忆，如实地写出来，公之于世。好在我向来有一个习惯，每遇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或出外作重大旅游，必记有日记。在反右，特别在十年浩劫中，曾被抄去作为罪证；在落实政策时，已大部分被发还了。这些残存的旧日记，可以供我做回忆的佐证或线索。

我常常想，新闻记者的职业，大概是容易缩短寿命的。因长期熬夜，不利于健康；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迫害。如名报人黄远生、邵飘萍、邓拓等均死于非命，壮年殉职；张季鸾先生则存年仅五十六岁，他早年备受压迫，几次陷于牢狱，中年接办《大公报》后，则一路顺风，名扬四海，直至因病辞世。我已度过八十春秋，经历则恰与季鸾先生相反，自踏入新闻界大门后，即受前辈之提携，年甫三十，即主持一家报纸笔政，也曾名噪一时。但自是以后，即与华盖运结缘，备历坎坷，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结束厄运，拾起秃笔，重理旧业，并从事新闻教育工作。

记得亡友恽逸群兄曾说过：他的经历，非常人所能想象；他所过的桥，比一般人走过的路还要漫长。他自感有责任把它写出来，“明夷待访”，以待来者。我的经历，自然远不及他壮烈凄苦，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一生的经历，都可以明明白白地摊开来。司马温公有一句名言：“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凑上一句：“胸有是非堪自信”，作为一副对联，用以自况。所以，自己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用不着推敲，更毫无“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处，可以信笔直书，无所隐讳；当然，因年已日近钟鸣漏尽，有些琐碎的细节，是记忆不周全了。

我写这本回忆录时，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的。我在旧社会经历了四十二年，除了童年及入学的十几年，简单顺序叙述外，主要力量放在创业时期那近二十年，所占篇幅约近一半。而特别着重于写新旧交替的1949年，写下近五万字。解放以后，所经历的大事，所接触的中外名人，当然更多。我则着重于写个人的亲身遭遇：因为有些人物和大事，尚待历史评议，我就只能“宜粗不宜细”地简单叙述了。

蒲留仙先生曾说，写鬼神易，状人难。我写《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特别写张季鸾先生的传时，有深刻的体会。至于这本回忆录，是否能如实地写出我的本来面目？则有待读者的评断。好在知我者尚多，和我同学、同事的尚多健在，希望不吝匡正和补充。

徐铸成

1987年10月20日写于上海

楔 子

今夏从南昌、庐山回来，忽酒后发生昏厥，头脑天旋地转，四肢乏力，吓得老妻和子孙辈一时无所措手足。医生说是“小中风”，经中西医悉心疗治，又是针灸，又是推拿，总算奇迹般地一步步恢复正常了。

这给我一次警告：生老病死，是谁都逃不了的自然规律。我脑子里留存着的一些经历、见闻、掌故、轶事，以及一些第一手的史料，该“留下”的，要赶快写了，莫等再这么来一次，就没有那样便宜，也许无常一到，就万事休矣了。

想到最方便的办法，是采用回忆录的体裁，从幼年时起，凡印象深刻的，事无巨细，一股脑儿都写进去，仿佛是一个旧货摊，什么古董杂货全摆出来，让读者挑选。

写完了回忆录，不由得联想到胡适博士曾写过《四十自述》，此文我在30年代就拜读过。在抗战胜利后内战方酣之际，我又读过多遍。胡适博士那最精彩、也是那时人们最喜欢引用的两句话是“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以自况他当时立身处世的哲学。我现在的年龄，几乎已达胡适博士那时的两倍，自顾平生，立德立言，事业两茫茫，何敢比博士于万一。所幸一辈子蹉跎颠沛，幸免于当任何人的卒子，堪自慰耳。

讲到胡适博士，也真是了不起的人物，二十六岁就学成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当时的北大文学系，名学者如林，如中英文造诣极深而以怪僻、保守闻名的辜鸿铭，如章太炎入室弟子黄季刚等都在此讲学。胡适博士初出茅庐，尚在美国留学之际即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在陈独秀办的《新青年》上撰文，提倡白话文，并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所向披靡，视这些国学大师如无

物。50年代初期，曾受到有组织的批评，说他宣传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贩卖”杜威的实用主义，是直接反对马列主义的，在大陆，当时曾被说成是恶毒的敌人。经过三十多年时光的实践检验，结果怎样呢？那些自以为是马列主义权威的人，所干的倒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比杜威更“实用主义”的实用主义。先是无缘无故迫害知识分子，后则成批整自己人，整老干部，再后就一步一步地“大胆怀疑”（完全是无影无踪的幻想），大胆判定某某某的罪名，以致使之被冤屈、折磨而死。还有，因为个人的好恶，便可以杜撰事实，凭空制造一个典型，爱之抬到可以“上天揽月”，抑之可以打入十八层地狱，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回头看看胡适博士当年介绍的实用主义，应该说倒是很科学的。大胆假设，为了发展真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假设不妨大胆些（当然与无根无据的海阔天空的“假定”大有区别），而求证一定要小心，要实事求是，这里面，似乎没有一点所谓唯心论，也谈不上形而上学。

我和胡适博士，曾有幸有过几次接触。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那时，胡博士虽主讲北大，而不时来南方公出，除中美文化基金委员会等要他主持外，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虽年龄较长，而奉之如名师。事无大小，都要向胡博士请教——如朱经农之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长，就是胡博士推荐的。那年，《大公报》上海版初创。有一天，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宴请胡博士于八仙桥青年会附近的锦江餐馆（那时，不仅近日第一流的大饭店——锦江饭店尚未开设，即法国公园附近的锦江小吃部也尚未设立，而锦江餐馆即以卫生和服务周到闻名），陪客仅我和李子宽、张琴南和许君远几位《大公报》的高级人员。记得那天席间，胡博士曾一再称许《大公报》是“小人国”中的巨无霸。现在想来，不胜今昔之感矣。又说，欧美有名报纸，都讲求保存报纸的办法。他建议《大公报》每天至少保存五至十份，用蜡涂抹（当时尚无涂塑及微缩保存办法）。他力言

这是《大公报》的百年大计，否则，一旦存放年久风化，就难以挽救了。

那次聚晤，我仿佛印象犹新，博士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而屈指计之，已历半个世纪，不仅胡博士已成古人，即我能历举的彼时在座诸公，全部已登鬼域，真不胜怆然。所幸这几年国内评价古人，已逐渐实事求是，胡博士的重要学术编著，已有重新付梓；他的“胆”，已经近于“拨乱反正”了。

我是1907年农历五月十四日在江苏省宜兴县城内东珠巷狮子巷口一个古老家庭里出生的，到现在应是七十八岁零三个月，说“八十自述”，是有些“虚头”，但照南北朝的说法，人生过了七十，即可谓“行年八十”，那我已“行”了很长一大截路了。再按香港积闰的惯例，我已可称为“享年八十有余”。无论如何，到我这回忆录连载完篇，编次出书时，肯定已过了八十整寿。如果书在国内出版，印刷周期动辄在一年以上，那么，问世时，我早已行年九十了。

1985年9月18日

我写这个楔子，是在1985年9月。接着写了回忆录正文，想赶在整寿前写毕，以为纪念。刚写好的二三万字，寄港发表，不幸被殷洪乔所误，遂嗒然搁笔。友朋闻讯，十分惋惜，多鼓励怂恿仍赓续写毕，谓此项纪录，可以补近六十年我国新闻史料之不足，且为我国现代历史保存不少轶闻。闻之又跃跃欲试。又一年多过去了，真到我八十“大庆”这一天了，势不能再拖，乃握管濡墨，从头补记如下。

1987年6月26日

第一章 负篋求知（1907—1926年）

1907年 出生

1907年6月24日（岁次丁未，农历五月十四日），我出生于江苏宜兴县城内东珠巷狮子巷口一个大杂院中。

这座宅子，是城内有名的破“墙门”，正厅三楹，还是明代遗留下的古建筑。同居有十余家，大半系同姓疏房，各分居一二间这祖遗产业。

曾祖仲安公，稍通文墨，只有自置薄田二十余亩，主要靠经管族中公产维持一家生计。是年他七十八岁，经常盼望在翌年八十初度时能得一曾孙，这样，在“撒手”见阎王时，就不必下跪了。我的出生，实现了他老人家梦寐以求的想望，“其喜可知也”。

祖石樵公，时年五十六岁，在酿酒行经管账目。我的祖母宗氏，对我最为宝爱。生有三位姑母，长次两位已适范氏、余氏，均居农村，有一叔父，早岁在酱园当伙计。

曾祖母及我的母亲，均朱氏。

1908年 一岁

是年曾祖父八十初度，特请宜兴第一家照相馆——蓉镜轩来家摄“合家欢”，曾祖特在额上题有“八旬大庆，四世同堂”八个字以志庆。

1909—1919年 两岁至十二岁

1909年，曾祖病逝，我已能麻服匍匐在灵前，掩面作悲哀状。